

● 历史学

武汉会战万家岭大捷原因论析

· 敖文蔚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敖文蔚(1945-), 男, 湖北监利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华民国史教学和研究。

[摘要] 武汉会战万家岭大捷的客观原因为: 日军在初战得胜后骄纵胆大, 孤军深入, 加之作战地区全为山地, 日军运行困难, 孤立少援, 较为被动。其主观原因为: 我统帅部抓住敌方上述弱点, 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 一举将敌包围而予以痛歼。此外, 我军在这次大捷中所表现出来的优良战斗作风, 亦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武汉会战; 万家岭大捷; 集中优势兵力

[中图分类号] K 265. 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4-0151-05

在抗日战争中, 由于中日两国综合国力悬殊这一根本原因, 我军在较大的战役、战斗中难以取得胜利。武汉会战(或称武汉保卫战)为抗日战争初期也是整个抗战时期的一次最大战役。它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组成的。这次会战虽然以武汉失守及日军的其他胜利而告结束, 但中国方面亦曾获得一些战役和战斗的胜利, 赣北万家岭之役便是这些胜利中最突出的一例。这次大捷歼灭日军第106师团官兵1万余名, 给敌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但以往的研究只重视平型关、台儿庄等大捷, 而对万家岭大捷却缺乏深入研究。甚至有学者认为, 这一胜利是由于中国军队“第一兵团边战边退将日军引入万家岭口袋阵地”、“运用口袋战术”所取得的^[1](第10页)。笔者未敢苟同, 特依据原始资料提出拙见, 以与同仁商榷。

一

在战争中, 一方的胜负与另一方有关因素密切相关。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够取得万家岭之役的胜利, 日军的孤军深入是一个重要因素。1938年6月上旬, 中国军队在黄河南岸花园口掘堤, 阻敌西进, 加之平汉线北段两侧我军频繁出击, 不断歼敌, 日军企

图占领郑州, 沿平汉线南下攻略武汉的计划濒于破产。在此情况下, 为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优点, 并以长江水道为后方交通线, 日军改以长江及其两岸西攻为主要作战路线。由于江北岸为湖沼地带, 不宜于大兵团作战, 而江南多山, 易守难攻, 于是日军以江南为重点作战地区。这样, 在江南战场, 为争夺每一座重要山头 and 每一条交通要道, 中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7月25日九江陷落后, 日军于7月31日计划以一部继续沿江西攻, 企图占领江南之瑞昌, 而以另一部进攻南浔路, 妄图夺取德安^[2](第123页)。上述计划之重心乃在后者。因为南浔路不仅地处庐山西侧, 影响该地战事甚巨, 而且它是南昌、九江间的唯一交通要道, 进可攻占九江和袭击长江水道, 退可固守南昌,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德安位于南浔路中途, 其得失直接影响南浔路安危。有鉴于此, 中国统帅部亦决定在德安一带与敌进行决战。于是, 中日双方争夺南浔路及德安的战斗于8月初开始, 十分激烈。9月3日, 敌第106师团沿南浔路进占德安以北之马回岭, 而自瑞昌向东南进攻的日军丸山支队先于此师团抵达该地。随后, 由于丸山支队很快调回瑞昌, 而自鄱阳湖西岸星子登陆的敌第101师团于庐山南麓受阻, 加之我军在马回岭、德安

间之乌石门一带利用山地构筑一倒“八”字形阵地,使日军不敢贸然攻击前进。这样,日军第106师团侵占我德安重镇的企图未能得逞。9月20日,敌第11军为加强江南攻势,加速武汉会战进程,决定再次命令第106师团夺取德安。但其作战部署不再是沿南浔路南攻,而是经南浔路以西突破五台岭一带我军阵地,进入德安西南地区,从侧背进攻德安附近。并且规定,在准备攻击的阶段,特别要作战意图保密^[2](第175页)。9月25日,第106师团除留一部守卫曹家坡、马回岭外,主力开始行动。在避开乌石门以北我军倒“八”字形阵地后,经南浔路西之闵家铺、面前山、五台岭南下。然后,该师分左右两个纵队行进,但左纵队在万家岭东南之层岭遭我攻击,进退两难;右纵队在万家岭北方之马尾塘、何家山遭我攻击,未能再进。

那么,第106师团孤军冒进陷入困境是怎样造成的呢?

其一,这是日军骄纵胆大所致。本来,九江陷落后,我军在南浔路方面布置三道防线,英勇阻击敌军,使第106师团伤亡甚重,其参战的中队长、小队长伤亡约半数。同时,在庐山南麓配合第106师团夺取德安的第101师团亦因战斗失利,与我军对峙。日军在接连遭受挫折后,决定改变作战路线,从侧面进攻德安以北地区。8月21日,第11军发布《吕集作战第34号》文件,令第九师团以有力一部“经瑞昌附近击败途中驻在之敌,向德安以北地区前进,切断庐山西麓之敌退路”^[2](第158页)。此后,第九师团派丸山支队自瑞昌经新塘铺、岷山、河里余村绕攻马回岭,终于占领德安以北地区。对于日军来说,这次攻占马回岭成功造成两个后果,一是敌被阻于德安以北我乌石门一带倒“八”字形阵地,难以沿南浔路正面再进;二是日军以为我军在南浔路以西兵力单薄,不堪一击。若攻取德安,可像绕攻马回岭一样,采用迂回战术,孤军深入,即再来一次绕攻。于是,骄横放肆的第27师团便奉命自瑞昌沿瑞(昌)武(宁)路攻向簪溪(万家岭西偏南),以威胁德安西侧,为其友军第106师团前进解除困境。但出乎意料的是,我第30集团军等部已先敌一着在簪溪以北、万家岭以西构筑纵深工事,正等着敌人。9月25日以后,第27师团在覆血山、麒麟峰、白水街一带接连受挫,一部向北溃逃。稍后,企图与第27师团相贯通的第106师团右纵队因被阻于何家山一带,这样,第27师团既难攻取簪溪,又不能靠近第106师团,处于进退无门的境地。总之,日军三次孤军深入,只有第一次获得成功,其余两次皆因骄横妄为及其他原因而失利。

其二,这是我军予敌重创的结果。日军虽为孤军深入,但由于所携粮弹较为充足,武器装备精良,以及空投条件优越,仍有较强的作战能力。在此情况下,我军努力歼敌,曾几度将孤立少援之日军截成数段,使之交通补给线断绝,相互联络中断,以致孤军无援。在瑞武路方面,我陈沛部第60师为收复白水街、麒麟峰,与敌肉搏达旦。后敌不支,被迫由朱家塘向北溃退。我第91、第142师曾在小坳地区将第27师团后方交通线截断。在第106师团方面,我军于面前山等地将其补给线截断。因当时天气不良,敌机亦未能进行侦察和补给,因而该师团因粮食不足影响战斗力。其实,我军在瑞昌至马回岭间作战失利,主要由于准备不足,各部配合不力。但以后总结了教训,故在敌第二、第三次迂回绕攻时,我军凭借已筑好的工事奋勇抵抗,协同一致,使敌陷入困境。

其三,这是我军利用有利地形的结果。瑞昌、武宁间以及马回岭、万家岭间均为山地,其山岭高度大都在海拔300公尺以上。由于山高林密,敌方重武器运行困难,部队行进速度缓慢甚至给飞机侦察带来不便。在此情况下,我守军利用复杂多变的山地地形,给敌以沉重打击。敌前进时,多取道两山间的河谷地带,这也是山区公路所经之处。而我军居高临下,正好予以痛歼。在武汉会战中指挥江南战事的敌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攻占武汉时,“敌非敌,地形是敌”,甚至哀叹“长江南岸地区山连山的地形,使人烦恼”^[3](第358页)。很显然,其苦衷应包括上述山地作战。

二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队是靠“口袋战术”取得万家岭战役胜利的。那么,实际情形如何呢?难道一向狡黠的日军突然变得愚蠢起来,竟然自投罗网?首先,我们应弄清楚,日军第106师团是怎样到达万家岭附近地区的。万家岭位于德安以西20公里处,而德安至万家岭以东栗林冈村间共约14公里为丛山峻岭,最高峰达515公尺。所以,第106师团左纵队欲攻德安西南,必绕过高山地带,经万家岭附近南下。在右纵队方面,原计划自五台岭向梨山(柘林东北15公里)、二房郑(万家岭东北2公里)一线前进,以与左纵队呼应,并靠近第27师团。由此看来,第106师团两个纵队抵达万家岭附近,是由其战略目的所规定的,不是受我方行动的影响而临时改变路线。当然,敌右纵队由于在何家山一带受阻,未能到达梨山一线,因而距离万家岭还较远。

敌抵万家岭附近后,中国军队到底是怎样对付

的? 万家岭一带为山区,大小山岭连绵不断。但在万家岭、邓家山、梨山、张古山之间因地势相对平坦,分布着一些村庄。以作战地之一的万家岭命名的此次战役就发生在这4山之间。不过,战前我军并未在此部署兵力。自敌在层岭、何家山等地受我攻击后,觉得形势不妙,停止前进。为抢占附近有利地形准备顽抗,敌左纵队自层岭向西北方行动,于万家岭及其以西之田铺苏、以南之箭楼苏构筑工事。而敌右纵队则陆续南下,与左纵队会合,修建工事,以便一同抵抗我军进攻。其间,我军在万家岭东北两面兵力有限,故双方未发生大规模战斗。这就说明,日军到万家岭地区虽为我逼迫所致,但并不是薛岳兵团“采用边战边退的办法”对敌实行“引诱”的结果。

敌孤军深入,早就引起第九战区第一兵团的高度重视。9月24日,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决定于万家岭方面增加第九集团军,而第九集团军副司令李汉魂改由薛岳直接领导。此后,他们2人立即赶到修河北岸督战。当蒋介石从薛岳和陈诚的电报中得知孤军深入之敌第106师团已中止前进,正向万家岭一带集结,其补给线多次被截断的情况后,于10月2日命陈诚转令各部:“应乘胜进攻,挽回危局。诚千载一机,望力图之”^①。10月4日,薛岳在修河以北、万家岭以南之白槎与李汉魂、叶肇(第66军军长)、俞济时(第74军军长)等彻夜商讨万家岭地区作战事宜。当时,敌虽受我打击,处境不利,但后方交通线并未完全被截断,空中运输因天气转晴业已恢复,增援部队仍陆续到达。在此情况下,若第27师团自白水街以西至箬溪以北一线再次东进,与第106师团会合,我军则难以“挽回危局”。针对敌方这些有利条件和可能发生的行动,我军决定立即抽调数倍于敌的兵力将万家岭地区日军包围起来,予以歼灭。早在9月底,薛岳令德安方面抽出第4军及第74军第58师“转用于左翼作战”^②。至10月3日,第4军已占领公母岭(不含)、小金山(万家岭以北)、大金山(万家岭以南、不含)一线,第58师已占领大金山、狮子岩(大金山以南)一线,在万家岭东北、东南构筑工事,向西截击。前来增援的永修方面第139师一旅、乐化附近第187师一旅则由狮子岩西南之墩上郭东西一线迎击。但由于敌援兵不断增加,我守军伤亡甚重,势将不支,故自4日始,我由瑞昌火炎坳调第142师,由德安调第51师,由庐山西南隘口调第66军,向万家岭、石堡山(万家岭与梨山之间)一带作战,“先解决此于我最有危害之敌”^③。与此同时,为防敌第27师团在突破我覆血山、马鞍岭一带阵地后夺取箬溪,再东进万家岭地区以南,我遂将白水街方

面新编第13师、昆仑山(白水街以西)方面第60师、预备第六师转至杨家洼、来龙岭一带,对北占领阵地,迎击南窜之敌^④。原在何家山作战的冯占海部第91师亦在万家岭地区西北之凤凰山、马鞍山及头口占领阵地。至此,中国军队在万家岭地区四周对敌第106师团的包围圈正式形成。

日军发觉被我包围后,立即以飞机、炮火猛轰我四周阵地,并掩护其部队之进攻,企图突围。当时,我空军因飞机损失太大而补充困难,未能出击,只能靠陆军作战。我军逐步压缩包围圈,并于5日开始第一期攻势。自此以后,战斗主要在东起万家岭,西至潘村附近,北起刘鞞鼓村,南至背溪街、张古山,约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5日,我军在击溃扁担山向大金山、狮子岩突围的一股日军后,又在背溪街、长岭作战,并在长岭以西之张古山、杨家山歼敌数百人。6日,我军在石堡山、长岭、张古山等地与敌发生激战。由于敌机狂轰滥炸,华军伤亡很大,张古山北端失守。至7日,我军攻势虽进展不大,但鉴于须在敌陷入困境而未得增援前对其连续攻击,遂决定自当日夜开始第二期攻势,即实行总攻。此后3天,战斗愈来愈烈,我军将万家岭地区大金山、狮子岩、长岭及王家山、熊家坂、樟树宋、石堡山、梨山、石马坑刘等地收复。自9日晚开始,第一兵团薛岳部决定乘胜实行决战,进行第三期攻势。因此时敌被压缩于万家岭、田铺苏、背溪街一带狭小地区,援兵断绝,顾此失彼,为我歼敌的好时机。经一夜血战,至次日即10日上午8时,万家岭战场核心区之箭楼苏、田铺苏、聂村、万家岭、潘村、背溪街等被我军攻占。残敌一股千余人向张古山一带逃窜。而另一股数百人自第106师团司令部驻地刘鞞鼓村向西北逃之夭夭。其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差点被我生擒。这就是万家岭大捷的主要经过。

显而易见,中国军队在万家岭战役中主要采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决不是什么“口袋战术”。从理论上讲,战史上只有伏击(埋伏)、夹击及包围等战术,并无“口袋战术”这个名词。究其原因,皆因作战双方的指挥员一般不是极愚蠢者,不会甘心情愿地朝敌方“口袋”里送死。从实际上讲,第106师团部队陆续进入万家岭地区时,而其四周并不都有我军占据,无所谓“口袋阵地”,更无所谓我军“边战边退”,将敌“引诱”到这个“口袋阵地”中。如前所述,先有日军进入万家岭地区,后有我军调抵该地区四周,逐步实行包围。要知道,在大批日机参战,每天对我陆续侦察的情况下,我方是无法将偌大的“口袋阵地”隐藏起来的。因此,日军亦不会闭

着眼睛朝我方“口袋”里钻。

三

在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军的抵抗是比较努力的。而在万家岭之战时,其抵抗更为英勇。这是取得此次胜利的又一基本原因。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能走能打,不失战机。兵贵神速,当我军对万家岭地区之敌的包围时机成熟时,须当机立断,以最快的速度抽调数倍于敌的兵力部署于该地区。而在执行这一决定时,被调部队是否如期到达目的地,就成为能否取得此役胜利的关键。在奉令调动的 10 余个师中,原驻地远在乐化(南昌以北)、永修、德安、隘口等地者兼程前进,不顾跋山涉水之苦,按时赶到战场。为保持行动秘密,第 66 军自隘口出发时,只得选择黄昏时分,因而遇到不少困难。两天后,当敌发现我转用兵力时,第 66 军已在万家岭地区参加战斗。欲捉住战机歼灭日军,不仅要对战场内的敌人适当进行分割,解决于我最有危害者,而且须将第 27 师团隔离于战场之外,使之不能直接援助第 106 师团,这就要求我军在某些重要阵地必须打胜仗。背溪街位于潘村、田铺苏、箭楼苏和张古山之间,其得失于我影响甚大。在第三期攻势中,敌在友军增援下,于背溪街东南小庙附近凭着工事拼死抵抗,战斗至为激烈。王耀武部第 51 师经反复拼搏,终将此地攻下,为夺取万家岭地区南部战斗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自第 27 师团于 10 月 2 日、5 日先后攻占修河北岸大桥河、箬溪后,万家岭地区西南形势更为紧张。于是,我军一面沿修河南岸柘林、龙腹渡、箬溪至津口一线派兵守备,一面于大桥河附近之棺材山、罗盘山及箬溪以东抵挡敌军,因而,在万家岭战役期间,日军两支大部队无法接援。

第二,连续作战,不顾疲劳。在万家岭战役期间,自从远地调兵,至将包围圈内敌军歼灭,前后大约经过 9 天时间。因此,我军连续作战是保障取胜的重要因素。否则,敌可能乘隙突出包围圈,使我功亏一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每个山头,每处村庄,反复争夺,1 日数易其主。若稍有松懈,必遭失利。在扁担山战斗中,陷入窘境之日军担心被俘,拼命抵抗,我军亦愈战愈烈,以致该地 5 次易手,但最后为我攻取。9 日夜 8 时,第 51 师突击队向张古山北端进攻,以夺取制高点,战斗极为艰难,双方争夺凡 5 次之多,卒被我克复。这种不分昼夜地战斗、直至最后击败敌人的部队为数甚多。从我全军来看,连续血战达 9 天 9 夜,以致双方伤亡皆重,而敌方伤亡尤大于我。

第三,英勇抗敌,不怕牺牲。在战斗处于不利之

时,日军根据风向、光照等条件施放毒气,欲置我于死地。我官兵不顾一切,顽强抵抗,以致中毒受伤、牺牲者常有出现。团长梁佐勋中毒后五官出血,仍坚持指挥所部与敌争夺阵地,毙敌数百名。由于中毒甚重,他壮烈牺牲。在战斗中,由于双方距离很近,日机不敢投弹,我军便与敌展开肉搏战。8 日午后,我第 51 师一部为攻占张古山制高点与敌肉搏,第 305 团团团长唐生海、营长胡雄均负重伤。因我顽强拼搏,毙敌近千。至黄昏时,我集中全力出击,终于克复此制高点。在万家岭战役中,无论阻击战、争夺战,还是围歼战,我军都打得极为英勇。在这些部队中,以第 74 军第 58 师(冯圣法为师长)最为突出。该师自 9 月 30 日起,“与敌激战九昼夜,伤亡营长六员,连排长 127 员,士兵 4000 余名”。战斗结束时,“全师战斗兵仅编并一营,干部已伤亡殆尽”^⑥。第 58 师的作战地先后为万家岭、箭楼苏、背溪街、张古山、墩上郭等,这是万家岭战场的主要作战地区。该师以英勇作战和巨大的伤亡为我军夺取此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综前所述,万家岭大捷是我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结果。即是日军孤军深入,亦与我军对其打击有关。假若没有南浔线上我方顽强的阻击战,造成敌巨大损失,日军则可由南浔正面攻取马回岭及德安,而不必以 3 次大的行动,经山地实行孤军独进,绕攻我据点。至于庐山南麓之敌第 101 师团遭我打击,与我处于胶着状态,进展极慢,未能有力配合南浔方面友军,亦为促使第 106、第 27 师团孤军深入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为充分发挥广大指战员的战斗力,以弥补武器装备等不足,我军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歼灭敌军的作战方针。此为这次战役中我军指挥艺术的精髓。在国民政府军进行的武汉会战及其他会战、战役和战斗中,由于往往采用机械的、保守的方法部署和使用兵力,因而常常失利。具体说来,这种方法为处处设防,官兵奉令死守一地,无机动灵活的余地,结果处处被动。对此,援华苏联总军事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深有体会地批评道,中国人“在日本人可能发动进攻的狭窄战线上堵上防御‘塞子’。”“总的说来,中国人整个防御是消极抵抗:充作‘塞子’的军队在打仗,而其余军队通常都在待命。”^[4](第 617 页)但万家岭战役却不是这样。我军在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歼敌的过程中,将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打得比较灵活。当然,集中优势兵力不是简单的问题,它要求指挥者对于敌我双方诸种情况有极周到的了解和极深刻的分析、判断。10 月 5 日,中国统帅部在讨论是否将隘口方

面的第66军西调时,曾发生过分歧。因调此军支援武宁箬溪附近(后第66军改调万家岭以北)友军,有动摇我庐山南麓阵地而影响德安。最后还是决定抽调第66军。因为从战略上看,宁可失德安,不可失武宁。若失德安,将危及南昌。但宁可失南昌,不可失通山^[5](第393页)。由于通山、武宁为粤汉路屏障,关系武汉安危甚钜,因之,粤汉路重于南浔路。故这一决定颇有战略眼光。结果,因万家岭之役我军胜利,德安亦得以保住。由此看来,万家岭大捷中我军采用的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方法,也是总结抗战时期正面战场成败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 释:

- ①②③④⑤ 参见《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所载1938年10月2日蒋介石致陈诚电;1938年10月4日陈诚致蒋介石电;1938年10

月15日陈诚致蒋介石电以及1938年10月11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电。

[参 考 文 献]

- [1] 章绍嗣,等. 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Z].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 [2] [日]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M]. 田琪之译.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 [日]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回忆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5] 徐永昌. 徐永昌日记:第4册[Z].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责任编辑 张 琳)

Great Victory of Wanjialing in Wuhan Campaign: Reasons

AO Wen-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AO Wen-wei(194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reasons of the Great Victory of Wanjialing in Wuhan Campaign are that the Japanese army became an isolated force penetrating deep into our territory because the heads of the army were arrogant and feckless after winning a victory in early days of the war; and that the Japanese army advanced very difficultly because of the war zone being all mountainous; as a result, the army fell into a passive situation. The subjective reasons are that our supreme command made the enemy be surrounded and annihilated by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enemy's weak points, and adopting the operational policy of concentrating a superior force to wipe out the enemy one by one. In addition to these, the excellent behavior our army displayed in the war was also the majo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great victory.

Key words: Wuhan Campaign; the Great Victory of Wanjialing; concentrating a superior force